

● 翁 寒 松

从 时代的产儿 到 时代的弃子

法兰克福学派述评

江苏人民出版社

从时代的产儿到时代的弃子

——法兰克福学派述评

翁 寒 松

江苏人民出版社

从时代的产儿到时代的弃子

——法兰克福学派述评

翁 寒 松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12,030

1986 年 9 月第 1 版 198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700 册

书号: 2100·032 定价: 0.94 元

责任编辑 周文彬

序

为师者的最大欣慰，莫过于看到自己学生的成长。今见我的博士研究生翁寒松同志，在学习期间即有专著出版，喜悦之情更难自己，故不避偏爱之嫌，为之作序。

寒松的著作，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全面地、鲜明地对立起来，抓住“批判的社会理论”从客观规律性方面否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主观能动性方面否定无产阶级是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力量这两个要害，进行了较系统、较深入的分析和批判，立意不凡，颇有气势。

书中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愉快原则”和“现实原则”之矛盾观的揭露；对它把个人的心理要求当成支配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的批判；对西方无产阶级为什么沉默、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及对它的意识等问题的分析，都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不乏精辟独到之笔，说服力也比较强。

书中对世界性科技革命潮流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的分析很有意义。这部分分析不仅比较令人信服地批判了在西方很流行的“技术决定论”、社会政治结构“趋同论”等错误观点，而且有根有据地考察了世界性科技革命的未来发展将给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些什么”。这可以说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一种尝试。

这本书自然带有新手们一般难免的粗糙、疏漏之处，但

总的来讲,不失为一部水平较高的评述现代西方思潮的专著,值得一读。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工作的同志也会有参考价值。

我期待着寒松和其他青年同志有更多的好作品贡献给社会。

李秀林 1985.11.24

目 录

序·····	李秀林 (1)
前 言·····	(1)
第一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衰演变·····	(4)
第一节 法兰克福学派的产生·····	(4)
第二节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演化·····	(11)
第二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	(21)
第一节 “愉快原则”和“现实原则”的矛盾是社会 发展的决定力量·····	(21)
第二节 “多余的压抑”产生变革社会的必要性·····	(27)
第三节 “新社会主义”是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	(32)
第四节 科技革命是实现“新社会主义”的“客观 精神”·····	(37)
第五节 “新左派”是实现“新社会主义”的中坚 力量·····	(40)
第三章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基础的反科学性质·····	(48)
第一节 抹煞人的需要的社会性·····	(48)
第二节 否认生产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53)
第三节 宣扬个人至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59)
第四节 向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倒退·····	(63)
第五节 西方心理学界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批评·····	(68)
第四章 如何理解科技革命的社会政治效应·····	(73)

第一节	世界性科技革命潮流的一般社会政治进步作用·····	(76)
第二节	科技革命潮流的社会政治效应的特殊性···	(83)
第三节	科技革命本身有所谓社会“副作用”吗·····	(96)
第五章	关于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力量问题·····	(102)
第一节	摆脱资本的统治是无产阶级的固有要求···	(102)
第二节	西方无产阶级“沉默”的原因·····	(107)
第三节	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及其自我意识·····	(113)
第四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结构·····	(118)
第五节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	(121)
第六节	“新左派”是臆造出来的“社会力量”·····	(127)
第六章	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132)
第一节	资本主义自动化生产中的劳动过程·····	(133)
第二节	资本主义自动化生产中的价值创造·····	(139)
第三节	资本主义自动化生产的发展和劳动价值论的未来·····	(143)
第七章	法兰克福学派给我们的理论启示·····	(146)
第一节	“批判的社会理论”的主要合理之处·····	(146)
第二节	现时代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主体性原则···	(148)
第三节	美的王国——人类未来的世界·····	(157)
结束语 ·····		(164)
后 记 ·····		(166)

前 言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深刻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经验，在继承人类思想发展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结束了人类在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所处的“在黑暗中摸索”的状况，从理论上阐明了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

一百多年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人类解放的道路上展开了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革命实践，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总体上的英明预见性和科学指导意义。

但是，历史发展过程是极为复杂的。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日益增多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前未曾预料到的情况。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共产主义运动继续发展的同时，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科学技术水平高度发展，公众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二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挫折，三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摸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失误，这些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显得与社会发展事实不相吻合。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

等问题，成了西方某些原先这样那样地尊崇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所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便应运而生。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学派。该学派在解决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殊异性问题上，走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法兰克福学派这批曾经尊崇过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从最初那种力图“填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空白点”的“善良愿望”出发，走上了最终从总体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的道路。仅就该学派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者”自居、以“发达工业社会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蜚声西方的著名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思想发展进程来看，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当他竭力企图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时候，尚能对马克思主义持保留态度。但在五十年代，当他全面接受了弗洛伊德主义、竭力宣扬用弗洛伊德主义来“填补”马克思主义的“空白”、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结合”的时候，便从根本上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尔库塞又着重致力于分析新的世界形势和苏联的社会状况，以苏联的社会发展和西方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等等为依据，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结论，从而走上了全面、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评价，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存在价值，因而也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行。如果我们忽略或放松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分

析解剖，不注意研究当今世界上存在着的新事物和新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蓬勃发展的社会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之获得更大范围的众多民众的更深程度的普遍接受，更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日新月异、因地而殊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因此，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进行分析、批判，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义不容辞的和极为重要的任务。

近年来，国内哲学界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同志，翻译介绍、分析评价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著作和代表人物，批判了这一学派的错误观点，把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回避或不可忽视的问题，清楚地展现到了人们面前，因而对这方面的研究起了某种开拓作用。但是，从完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的角度看问题，他们在翻译的完整性、介绍的系统性等方面，尤其是加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方面，做的还是不够的。存在着或者回避问题，或者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简单“对照”，笼统指责一番了事的缺陷。这当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鉴于这种情况，本书拟从对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的方法论角度，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基本观点，作一个较为系统的介绍；对法兰克福学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错误观点，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批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合理思想，也试作某些有分析的借鉴与肯定，以求对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个比较合乎实际的认识。同时亦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问题，作一些必要的探索。

第一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衰演变

第一节 法兰克福学派的产生

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法兰克福城，盛行于六十年代的北美和西欧。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格律恩堡（Karl Grünberg, 1861—1940）、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阿道尔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其中影响最大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马尔库塞。鉴于已有论著对这些代表人物的生平和著作作过介绍，本书在这方面就不打算再作赘述，而是着重环绕法兰克福学派所创立的“批判的社会理论”这个核心，对它进行较为全面的剖析。

任何哲学、社会理论都是它那个时代的产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当然也不例外，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只要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历史和现状就不难看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是在当代工业技术革命酝酿、起步和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日愈深刻化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是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员在这些矛盾面前

“有心补祸、无力回天”的既失望、又希冀的复杂情绪和矛盾心理在哲学、社会学上的反映，也是一些曾经在感情上倾向于或尊崇过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发展事实面前表现出彷徨犹疑，从而企图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某些“修正”的结果。

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这场危机中，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而难以向殖民地转嫁危机的德国，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相比，德国的工业生产量减少了40%，其中钢的生产减少了69%，铁的生产减少了70%，国债近一百四十亿马克，失业人数近七百五十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44%。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德国无产阶级为反抗资本的残酷统治，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先后举行了一千多次罢工。深刻的经济危机和高涨的政治运动，使德国资产阶级不得不求助于法西斯主义来维持其统治。

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得势，德国工人运动以及民主势力遭到的残酷镇压，以及接踵而来的空前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的尊严大遭破坏。这种状况使得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安起来。他们在把战争罪责归咎于一两个战争狂人的同时，也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看到资本主义政治本身方面的问题，从而导致和加深了他们对某些资本主义现状的忧虑和不满，于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战争中发了军火生意财，增加了资本投资总量，又获得了战

败国的大量人才、科技成果、资源、设备等等，因而加速了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流动资本的周转，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大规模的科学技术革命。但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生产力，并没有带来某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期望的资本主义的“太平盛世”、“长治久安”；旧有的资本主义矛盾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弊病和精神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病态也愈益表现了出来。这就使得那些原先就对资本主义某些现状感到失望和不满的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增添了几分失望、颓废情绪和偏激、幻想色彩。然而他们又迷恋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繁荣，对这种畸形繁荣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法和解决方法，否定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于是他们便企图找到一种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前提下摆脱和化解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途径和方法，这样便产生了“批判的社会理论”这类貌似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感到愤慨并且“揉进了马克思的思想的”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由于德国许多工农群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家战败后的衰败景况面前，轻而易举地接受了纳粹党人的民族主义煽动，将国家的破败现象与造成这种现象的资本主义基础剥离开来加以理解，形成了一种具有压倒性的迎合纳粹主义的情绪，使得希特勒于三十年代初在“举国欢呼”中登上了独裁王座。面对这一严酷事实，以及目睹后来国际工人运动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曲折经历，一些原先尊崇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痛感到“历史与阶级意识”不是同步发展的，工农群众的自我意识发展状况往往是“决定社会行动和社会变革的更为深沉的原因”。于是，他们便开始

了“游离于马克思主义的基调和主题”的努力，去寻找一种“揭示人的内部意识发展或心理驱动对于历史发展的制约性的理论”，以便去“填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意识发展的‘内部线索’方面的空白”，从而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批判的社会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诞生的标志，是1923年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的成立。其首任所长是格律恩堡，一位带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历史学家。

这个坐落于美因河畔的“社会研究所”成立的初衷，是要“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所谓“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的含义，即突出了从社会意识方面理解社会生活的重要性，要求从主体的角度出发去探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社会模型，从而“从总体上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这种对“总体性”概念的强调的背后，隐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的不满，它象潜伏着的病变基因一样，为后来的理论变异埋下了伏笔。

但无论如何，诞生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仍然是从马克思主义起步并一度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观”的。格律恩堡在其就职演说中，明确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锁钥。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过程是观念上层建筑（包括社会心理建构）的最终决定因素的观点作为考察社会问题的先决前提，并使其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最初的研究工作的基调。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确实是旨在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这正是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风格。由于这一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特征并不象后来那么典型，至多只能算作一

个比较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缺乏建树的格律恩堡所长也并没有获得法兰克福学派鼻祖的桂冠，人们只是在刨根问底时才记忆起他。

情况在霍克海姆继任所长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当时德国正处于1929—1933年世界性资本主义危机的漩涡之中，而且作为战败国，人民生活异常困苦。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和长期受黑格尔“国家至上”观念影响的民族，此时终于受到纳粹主义宣传的迷惑。许多人不是从国家衰亡中看到德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魔影，反而由此激发出一种盲目、抽象的“爱国主义”激情；反对纳粹主义、战争意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倒成了众矢之的。最后，纳粹党人终于窃取了国家领导权，并一步一步地把德国民族推入深重灾难之中。德国特殊的历史情况，引起法兰克福学派对国民心理问题的倍加重视，同时也造成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决定论的倍加怀疑。因此，霍克海姆决定重新确定“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他所确定的该研究所要研究的首要问题，已不再是考察经济活动过程如何决定观念上层建筑了，而是考察在特定的社会集团、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时期中，人们的“心灵结构的变化”与社会变化之间具有何种联系，即揭示“心灵的联结性联系的复杂作用”。

霍克海姆的新宗旨很快就在弗洛姆，尤其是马尔库塞的努力中得以实现。

马尔库塞曾在柏林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就读，当过著名的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的直接学生。不久以后，他完全折服于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分析学说，并和弗洛姆一样，致力于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工作，亦即用弗洛伊德主

义的心理分析学说来“改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1933年以后，因其犹太血统，马尔库塞为逃避纳粹迫害而离开德国，最后定居在美国。这一期间，他相继出版了《理性与革命》、《批判哲学研究》、《爱欲和文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单面的人》等代表作，完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特征从“基因”到“病变”的过程，登上了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代表人物的“王座”。也正是由于在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那里全部完成了用弗洛伊德主义来“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法兰克福学派终于也就在理论科学性方面走向穷途末日，从而最终被时代所遗弃。这一点我们很快就可以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演化过程中看到。

由于获得了“时代的弃子”的命运，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之后无可挽救地衰落了。哈贝马斯算是这一时期中比较突出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但他的“社会交往”、“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等学说，充其量不过是马尔库塞《单面的人》等著作的内容的延伸和风格的继承。至于施密特等人，则更是象当年的霍克海姆一样，人们只是在谈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来龙去脉时才提起他们。

总起来看，法兰克福学派是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的德国这一独特社会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它最初是从马克思主义起步的，尽管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游离于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但多少还抱着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新的社会历史情况和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时代的产儿。但是，由于它在研究过程中用弗洛伊德主义“代换”了马克思主义基础，最终走上了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道路，并在实践中处处碰壁而终

于落到了时代的弃子的归宿。

需要强调的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渊源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是一种激进主义，它所继承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渊源于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批判的批判’、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这种提法只说对了问题的一部分，即法兰克福学派的确与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有着程度不同的渊源关系。但其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没有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批判’”的观点是牵强附会的；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直接继承了存在主义的观点是言过其实的。

首先，如前所述，法兰克福学派确实是从马克思主义起步的。造成法兰克福学派后来越来越否弃老一代代表人物的理论风格和研究基调的因素，并不在于他们一开始就厌弃马克思主义，而在于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即他们不关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基本理论及其与体系的各个具体结论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研究，不注意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的把握，而全力以赴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去“覆盖”和“度量”整个社会生活，一俟遇到“不符之处”，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但是，即便是当法兰克福学派最终走上了从总体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时，他们所用的一系列理论规范和理论方法，也没有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在他们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中，仍然经常出现一些忽隐忽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从而使他们的理论经常处于矛盾、混乱之中。

其次，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具有崇尚